

余额宝倒逼利率上升和银行改革

据报道,近期五大国有银行已悉数加入存款利率上浮到顶的队伍,即在央行存款基准利率基础上浮10%。此前,为避免存款竞争过于激烈,央行曾窗口指导五大行存款利率暂不上浮到顶。这次国有大行把定存利率一浮到顶,以一年期存款为例,相当于央行存款加息0.3个百分点。

互联网金融成为分流存款利器

“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来改变银行”马云曾放出豪言壮语。自去年6月余额宝上线之后,货币基金借道互联网加剧了银行存款流失,大型银行上浮存款利率到最高限,目前看来是被互联网金融巨头、基金公司等各家机构倒逼的结果。

互联网金融之所以能快速,一个重要原因是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金融服务。以购买门槛来说,此前基金门槛普遍在1000元以上。但是现在门槛降低到了1元。原本被传统金融拒之门外的闲散资金,现在迅速向互联网金融聚拢。

“余额宝”的横空出世让货币型基金备受关注,成为现金管理首选利器。借助互联网的影响力,以货币型基金为主要载体的互联网金融产品迎来大爆发。现金宝、零钱宝、活期通、钱袋子等各种类余额宝产品如海绵般以最快的速度“吸金”。

在去年6月余额宝上线之后,至年底已达到2500亿规模;而腾讯理财通上线,两日规模也已达到8亿。

居民储蓄存款向互联网理财产品流动的速度非常快。据媒体报道,今年1月份前20天,工农中建四大行存款大规模流失7000亿。央行发布《2013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13年,我国住户存款增加5.49万亿元,与2012年增加5.71万亿元相比,同比少增2200亿元。

为防止活期存款都搬到余额宝,招行最先对资金转出到支付宝设置限额,随后工行、农行亦跟进。这三家银行均为持卡零售客户较多的银行。

利率上升带来市场风险

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从利率的上涨开始的。余额宝大大提升了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给商业银行的运营安全带来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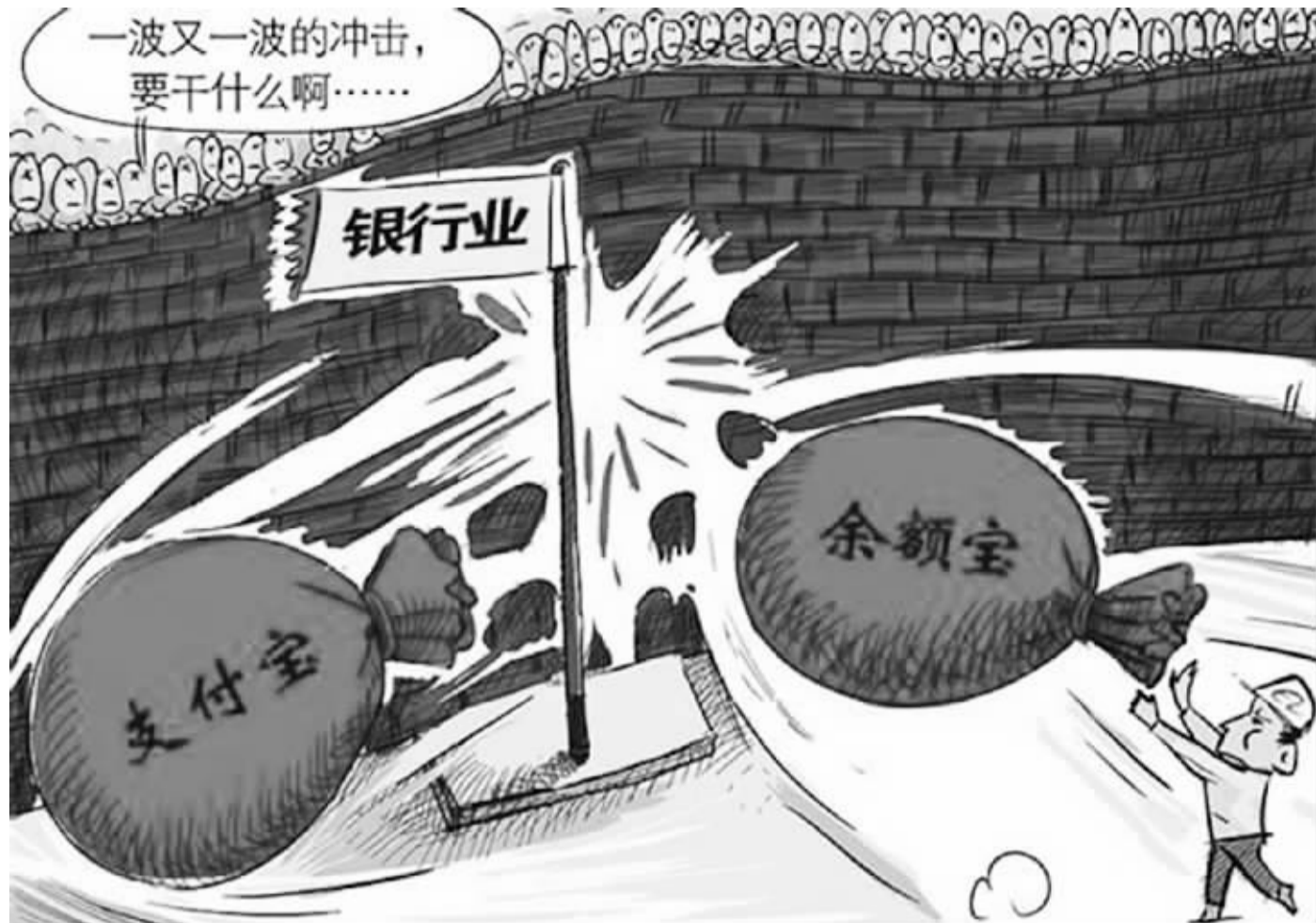
由于我国金融改革并未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刚刚推进到破除存款的坚冰,存款保险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商业银行也没有准备充分等等,这样上升的利率必然带来市场风险。

余额宝目前有超过80%的资金投资于银行协议存款,并靠赚取利差进行无风险套利。一位银行人士如此评价这次余额宝的冲击:“钱还在银行体系里,只是杀出了一个‘余额宝’,这么转了一下,什么都没干,就硬生生把银行的存款成本从0.35%的活期存款利率推高到7%。”事实上不少业内人士对投资者将银行活期转成货币基金,又以基金公司管理的方式转借给银行这种赢利模式感到担心。在银行人士看来,阿里的余额宝也一样只是赚了名声,去年半年即支付了18亿元的利息,成本压力不小,未来也存在赎回风险。余额宝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循环:前端以高息方式吸引大量资金从银行流出,逼迫银行存款或理财产品利率大幅上升,然后再把这些从银行流出的钱,以更高的价格利率存到银行。但这种逻辑不可能是无限的,当货币市场资金无限大时,可能就无处可投了,那么收益也就无从保障了,离自身出现风险也就不远了。

其实,无论余额宝、活期宝还是现金宝,本质都是披上互联网外衣的一种工具或渠道,它本身并不创造价值,甚至不少“宝”还要以贴息为手段,用超高的年化收益率作为竞争手段,吸引了公众的眼球,是变相高息揽存的一种。正因此,银行流动性最好的那部分活期存款,可能会被进一步分流,从而给银行带来了流动性压力,也容易造成“钱荒”。

商业银行存款上浮到顶,会削弱商业银行在利率管理上的定价能力和差异化战略,更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降低了商业银行的利润,给其经营带来了风险。

同时,目前我国经济内在增长动力减弱,在各种“宝”大量吸引资金的同时,市场利率上升会传导到实业,使实体经济即缺少资金,又增加了融资成本。而债务成本攀升,必将加



大企业债务资金链的紧张。

商业银行要积极应对

面对各种“宝”的冲击,商业银行也在积极应对。

商业银行要积极开展金融创新。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威胁,目前银行业已在个人金融业务和信贷风险监控领域积极开展数据分析,运用信息科技的强大计算能力及挖掘数据分析的价值,已成银行业共识。

事实上,银行也有各种宝,比如,“活期宝”是光大银行的一种具备较高流动性的理财产品,以5万元为起点,用户可以随时进行支取、转账和消费,收益率水平约为2.5%。招

行的“日日金”、兴业的“现金宝”均为此类产品。与各种宝相比,“活期宝”具备更便利的应用,但起点较高。如果从风险和流动性上考虑,银行的各种宝收益并不逊色互联网的各种宝,一旦银行上浮存款利率,在利率方面,互联网各种宝的优势将不再明显。

商业银行还需要放低身段、放低下限、放低购买金额起点,从而把活期存款户的资金留住。

商业银行业要提高产品定价能力。应在市场基准利率基础上参照合理的成本收益方法确定产品价格,同时还应考虑风险补偿、费用分摊、客户让利幅度、产品收益相关性及因提前还款、违约和展期等导致的必要的价格调整等因素,最终确定科学合理的价

格水平。

商业银行要通过发展中间业务、加强客户细分、发展人民币利率衍生产品业务提高产品的议价能力,应对市场化的挑战。

同时,监管部门在包容互联网金融大胆创新的同时,完善对网络金融的监管法规和监管机制,防止监管套利,以切实加强对各类网络金融业务的风险防控和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已是当务之急。

“余额宝”的出现,就像跳进金融市场的一个搅局者,它对利率市场化起到倒逼作用,银行要想留住自己的客户,除了开展金融创新,提高服务质量外,向储户提供一定具吸引力的利率标准也是不可少的。

(来源:全景网)

新兴市场资产遭抛售引金融动荡

继上周新兴市场货币大幅贬值和资产价格暴跌以来,27日新兴市场资产再遭大幅抛售,全球市场动荡延续。外界预计,在本周将要召开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可能酝酿第二次削减购债计划。分析人士称,这将进一步加速新兴国家的资本流出和本币贬值,新兴市场应警惕产生严重的“货币危机”。

据法新社报道,尽管一些新兴国家央行在上周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27日各新兴国家货币继续下跌。在早盘交易时段,土耳其里拉兑美元触及2.3616里拉兑1美元,再度跌至历史低点。另外,印度卢比兑美元一度跌至63.1150卢比兑1美元,为近两个月低点;泰国泰铢兑美元跌至32850泰铢兑1美元。

事实上,新兴市场在上周一一直承受巨大压力。据香港《文汇报》报道,由于阿根廷央行的外汇储备不足300亿美元,无力对其货币比索进行干预,上周五被迫放松外汇管制,比索单日下跌13%。阿根廷比索下跌,引发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货币集体下跌,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震荡。另外,根据美银美林的数据,新兴市场股票基金在1

月22日当周出现24亿美元的资金流出量,为连续第13周流出,创下近11年来最长的流出时间。

对于此次新兴市场资本外逃、本币贬值引发的金融动荡,外界认为,除了自身经济出问题外,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应该算是最大的外部因素。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仅仅是宣布这一退出步骤就在去年6月造成了投资者的恐慌,使他们从很多新兴国家迅速撤出资金,造成货币汇率和股市行情大跌。

美联储上个月意外宣布将购债规模从850亿美元缩减至750亿美元,伯南克还表示,在美国经济持续改善的前提下,美联储将在今年的八次会议上持续削减购债,缩减规模可能会维持在大致100亿美元。

28日至29日,美联储将召开今年的首次货币政策会议,并将于会后公布利率决议。由于23日公布的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四周移动平均值降到一个多月来的最低水平,显示就业市场继续稳步改善,市场普遍预计,即将离任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可能会在其主持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再度削减购债规

模,即从当前的750亿美元削减至650亿美元。

对此,许多业内人士表示,美联储继续削减购债计划,可能将进一步刺激新兴经济体的资本流出,从而加剧新兴市场甚至全球市场的金融动荡。

资本流动的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新兴市场金融动荡主要是由散户投资者引起的,如果机构投资者也加入到资本外逃的队伍中,那么这一动荡局面可能继续恶化。美联社指出,如果美联储的政策倾向于加息,那么尽管新兴经济体长期增长潜力好转,美国仍将成为更受青睐的投资市场,这将加速流动性从新兴市场撤离,导致新兴市场进一步的资本流出。

路透社称,尽管新兴市场资本外逃的状况本周或将持续,金融动荡的局面可能还将进一步加剧,甚至对美国自身造成负面影响,但美联储的缩减购债计划不太可能会因新兴市场遭遇大幅资产抛售而改变。

“此次,由于美联储在2013年底已经正式启动缩减购债规模,在未来两三天可能宣布继续缩减购债规模,这意味着美联储量宽政策已经进入拐点,投资者预期和国际资本

流动的变化已经出现。”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主管温彬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兼职教授赵庆明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此次新兴市场货币大幅贬值,与其说是受到美联储可能进一步缩减购债规模预期的影响,不如说是自身的经济基本面导致了资本大量撤出。

一些主流的国际投行的2014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大部分市场人士都看好欧美经济复苏前景而看空新兴市场。温彬说,全球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发展已经出现分化。以此次遭受较大“冲击波”的阿根廷为例,其经济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双赤字”特点,即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并存。在这样的国家,为了能够平衡经常项目逆差,当局往往愿意引入短期资本流入,这就体现为资本项目顺差。

“在流动性充裕的背景下,短期资本持续流入,能够推高股市、助推信贷扩张,表面上看上去红红火火,但是一旦资本撤离,就会出现股市暴跌、货币贬值。政府为了抑制货币下跌,愿意采取加息政策,但是加息又会重创经

济的复苏,所以,政府政策实际上处于两难。”温彬说。

不过,温彬表示,目前出现状况的新兴市场国家如阿根廷、土耳其经济体量并不大,对全局性的影响是可控的。但是,若这一状况蔓延至墨西哥和南非这样的大经济体量的国家,则有可能产生比较严重的危机。他表示,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接近50%的水平,尤其是一些大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一些大的经济体在过去几年的发展中,也得益于量化宽松,部分国家因此加杠杆,负债率较高,若短期内面临去杠杆,也将影响其经济增速。”温彬说。

赵庆明也表示,此次新兴市场的货币危机值得警惕和重视,但也不至于恐慌。“此次还是逐步缩减购债规模,市场流动性还是相对充裕。而对于危机的处理,则需要加强国际间的协调。”他说。

温彬则指出,如果风险高度扩散产生系统性危机的苗头,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会在技术和资金上给予支持,把风险控制可在可控范围内。

(来源:全景网)

如何使1亿人城镇化:中西部或成主战场

2014年,春节前春运的热点基本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冀等东部地区,而春节后热点则是中西部省份。这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恰好揭示了中国的异地城镇化特征:大量人口从中西部前往东部就业。在一个多月前,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中西部要实现这一目标,既吸聚人口,又要留住人口,而这需要产业基础、政策配套以及深层次的社会认同。

中西部或成主战场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13)》指出,2012年末全国城镇化率为52.57%;其中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分别为56.4%、53.4%、

44.9%。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副主席张少琴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与城镇化空间分布不平衡相伴随的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而整个中西部地区的生产总值相加才占全国GDP的39%。但同时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率低的另一种理解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空间大。”

因此,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断言,“未来中西部地区将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的主战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中西部城镇化率仍有10—15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

“内”“外”皆应城镇化

“家里有好工作,谁大老远跑过来打工呀?”家在山西原平市农村、目前在山东淄博打工的小刘,一语道出了“背井离乡”的最主要原因。在记者对几十名异地务工人员采访中,绝大多数人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有产业才能吸聚人口,才有城镇化的可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认为,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应通过形成西部地区城市群、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向中西部倾斜以及引导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三大途径提升当地城镇化水平。

如果说人口因产业聚集是一种外在的城镇化,那么进城农民内心融入城市,则是内在的城镇化。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雷晓康向记者反复强调“人”的城镇化。他说,要让进城农民认同自己的城市身份,这样才能减小可能产生的矛盾与摩擦。

一些必要的政策配套也被专家们普遍看重。例如与户籍制度挂钩的住房、医疗、养老等福利。

各地侧重有所不同

近期陆续公布的各省(区、市)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均把城镇化作为重要的章节来论述,尤其是中西部省份,大多提出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战略。

“城市群”是很多省份的发展重点,也是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提出的六大任务之一。

如山西支持太原率先发展,以形成太原城市群;内蒙古推进呼包鄂城市群建设,实现并联式、组团式发展。

有的省份强调发展县域经济。如云南计划重点支持一批县城做大做强,抓好210个特色小镇建设,促进产业与城镇深度融合;贵州重视在县城和小城镇通过产业发展集聚人口,为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就地创业、安居乐业创造条件;陕西计划建好43个重点县城、35个省级重点示范镇和31个文化旅游名镇,吸引农村居民就地城镇化。

(来源:人民日报)